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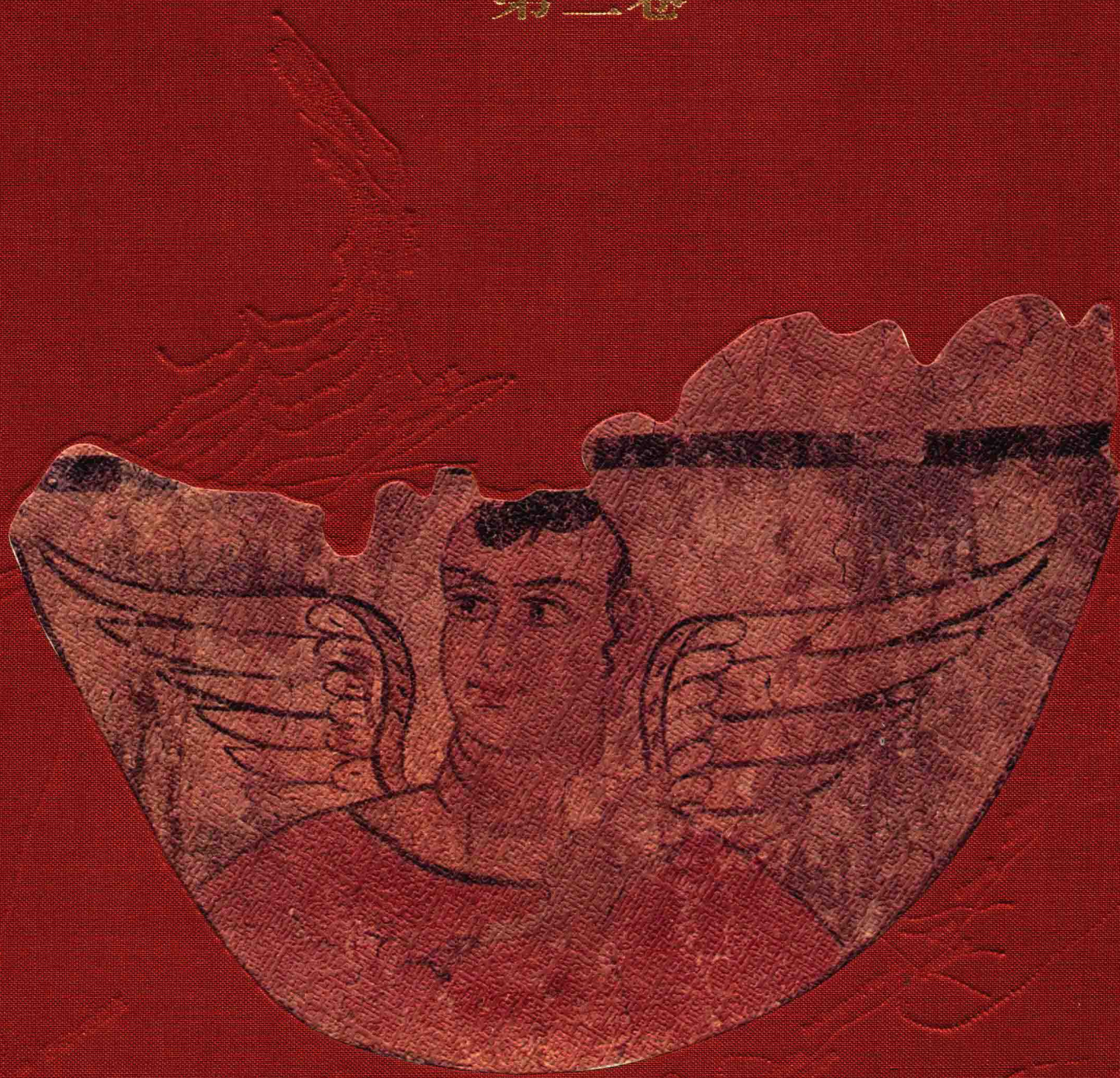
海外遗珍
西域考古图记

西域考古图记

原著/[英]奥雷尔·斯坦因
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Westernmost China*

第二卷



海外遗珍
国外西域考古  经典论著译丛

西域考古图记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Westernmost China*

第四卷

原著/[英]奥雷尔·斯坦因
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目 录

第十四章 从罗布沙漠到敦煌	325
第一节 从阿布旦到敦煌的道路	325
第二节 罗布沙道的汉文记载	327
第三节 马可·波罗及此后罗布沙漠之路上的旅行家	330
第四节 古代中国长城的第一批遗存	334
第五节 疏勒河沼泽旁的遗迹	337
第十五章 敦煌绿洲及其北部的长城	339
第一节 下疏勒河盆地的地理特征	339
第二节 探寻北部“旧墙”	342
第三节 首次在 T. XXVII 发现汉代文书	345
第四节 寻找长城上的烽燧 T. XXVIII ~ XXX	347
第五节 调查通往安西的长城 T. XXXI ~ XXXV	350
第十六章 南湖绿洲与阳关	352
第一节 敦煌与南湖之间地区的遗址	352
第二节 南湖绿洲及其目前的资源	353
第三节 南湖的古代遗址	355
第四节 阳关的位置	357
第五节 南湖北面的村落遗址	359
第六节 南湖遗址发现的遗物清单	361
第十七章 中国长城的尽头	364
第一节 长城的最后一站	364
第二节 长城的西南翼	368
第三节 古代烽燧 T. VI. b 及其文书	369
第四节 长城上的最后两座烽燧 T. VI. c 和 T. VI. d	373
第十八章 最西端的长城	376
第一节 从长城的最西端到 T. VIII	376
第二节 烽燧 T. IX、T. X 和沼泽地段的长城	378
第三节 废弃的烽燧 T. XI 和 T. XII. a	380
第四节 在烽燧 T. XII. a 发现的纸质粟特文书	382
第五节 烽燧 T. XII 与 T. XIII	386
第十九章 玉门关	389
第一节 T. XIV 废墟遗址	389
第二节 玉门关的位置	391
第三节 玉门关和阳关之间的辅助城墙	393
第四节 T. XIV. a 和 T. XIV. a 的垃圾堆	395
第五节 古代丝绸贸易的遗物	397
第六节 北新道	399
第七节 长城边上的古仓库	402



第八节 湖区的长城——T. XIX 至 T. XXIII 烽燧	405
第二十章 敦煌汉长城的历史与文献	408
第一节 敦煌以西的汉代长城	408
第二节 敦煌汉长城的修建过程	412
第三节 长城烽燧遗址的主要特征	414
第四节 军屯	417
第五节 守卫长城的官兵	418
第六节 长城守军的职责与生活情形	422
第七节 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物目录	429
第二十一章 千佛洞	450
第一节 遗址概述	450
第二节 千佛洞的碑刻	453
第三节 王道士和他的藏经洞	454
第二十二章 藏经洞的发现	457
第一节 密室的开启	457
第二节 藏经洞里的多种语言文书	459
第三节 密室藏经和艺术品的获取	462
第四节 后来对藏经洞的调查	464
第二十三章 在千佛洞石室发现的绘画	467
第一节 绘画的发现和过程	467
第二节 绘画的时间和环境	470
第三节 画的结构、材料和工艺	472
第四节 佛传故事幢幡	475
第五节 佛和菩萨	481
第六节 天王与金刚	486
第七节 成组的神祇	489
第八节 佛教净土画	492
第九节 各种绘画、版画和装饰性文物	496
第二十四章 千佛洞的织物和写卷	498
第一节 装饰性织物:起源、用途和工艺	498
第二节 织物中的中国风格图案	501
第三节 萨珊风格的图案及其仿制品	504
第四节 藏经洞中发现的婆罗谜文和汉文写卷	507
第五节 藏文、粟特文、突厥文写卷	510
第六节 千佛洞的粟特文和突厥文写卷目录	513
第二十五章 千佛洞石窟与文物	515
第一节 一些千佛洞石窟的装饰艺术	515
第二节 从千佛洞所获的绘画、版画、织物和其他文物目录	520

插图目录

145. 自洛瓦扎碱泉沿罗布泊湖岸向西望
146. 敦煌亭障 T.XXIII 西侧洼地孤立的泥土台地
147. 护送人员押送古物从阿布旦出发前往喀什噶尔
148. 153 号营地西北疏勒河古尾间盆地西缘一带被侵蚀的泥土台地
149. 敦煌亭障 T.III 烽燧遗址, 自东望
150. 敦煌亭障 T.XXVI 烽燧遗址, 自西南望
151. 敦煌以北石板墩被东干人破坏的寺庙遗迹
152. 敦煌以北 T.XXV 烽燧遗址, 自西南望
153. 敦煌亭障 T.XXVII 烽燧遗址, 自东南望
154. 敦煌亭障 T.XXIX 烽燧遗址及晚期围墙, 自西望
155. 敦煌亭障 T.XXVII 烽燧遗址及垃圾堆
156. 敦煌亭障 T.XXVIII 烽燧遗址及垃圾堆
157. 敦煌亭障 T.XXXV 烽燧遗址墙体结构
158. 敦煌亭障 T.XXXV 烽燧遗址东侧位于低矮沙丘间的古代边墙遗迹
159. 南湖古城城墙局部为沙丘掩埋, 自城内向东北角望
160. 南湖古城西北角附近的内墙遗迹, 自内向外望
161. 敦煌亭障 T.XXVII 烽燧遗址附近的古边墙遗迹
162. 南湖以北甘州的废弃农庄
163. 南湖以北甘州的废弃房屋
164. 南湖以北废弃在荒漠的农庄和篱笆
165. 南湖东北古墓地中带茕圈的坟墓
166. 敦煌亭障包含有 T.VIII 烽燧遗址在内的土墩, 自西南望, 发掘前
167. 敦煌西南道路边的现代炮台和营房
168. 敦煌亭障 T.VIII 烽燧遗址附属房屋 i 内部, 发掘前
169. 敦煌亭障 T.VI.a 烽燧遗迹, 自东望
170. 敦煌亭障 T.IV.c 烽燧遗迹, 自西北望
171. 敦煌亭障 T.VI.b 烽燧遗址及营房, 发掘前, 自东南望
172. T.VI.b 烽燧遗址后堆有垃圾的斜坡, 发掘前
173. 敦煌亭障 T.IX 烽燧遗址, 自西北望
174. 敦煌亭障烽燧 T.X 遗址, 自东南望
175. 敦煌亭障 T.XII.a 烽燧遗址的边墙, 自北望
176. 延伸到敦煌亭障 T.XIII 烽燧遗址东面的古长城
177. 敦煌亭障 T.XII.a 烽燧遗迹, 自西南望
178. 敦煌亭障 T.XI 烽燧遗址及围墙, 自西北望
179. 敦煌亭障 T.XIV 城堡附近的小丘, 上有标明古玉门关位置之遗迹, 自西南望, 清理前
180. 敦煌亭障 T.XIII 烽燧遗址及营房, 自东南望, 发掘前
181. 敦煌亭障 T.XII 烽燧遗址, 自西北望
182. 敦煌亭障古仓库 T.XVIII 围墙之西北角及垃圾堆, 发掘前
183. 敦煌亭障“玉门”之古堡 T.XIV, 自东北望
184. 敦煌亭障“玉门”之古堡 T.XIV 及西墙上的门
185. 锁阳城遗址, 自东北望, 前景上是内侧东墙, 远处右侧是西北角楼的塔
186. 敦煌亭障线上的古仓库遗址 T.XVIII, 自南望
187. 敦煌亭障 T.XIV.a(A) 烽燧遗址西侧的泥土台子及沼泽洼地
188. 自敦煌亭障古烽燧 T.XIV.a 西北望

189. 敦煌亭障 T. XIV. a 烽燧遗址西南的古边墙遗迹
190. 敦煌亭障 T. XX 烽燧遗址, 自西南望
191. 敦煌千佛洞全景, 跨河向东望
192. 阿拉塔木遗址全景, 连带哈密王之农庄及果园, 自东南望
193. 敦煌千佛洞主群组北端及中间群组, 自东北望
194. 自石窟寺主群组南端望向千佛洞东面赤裸的山冈
195. 敦煌千佛洞 Ch. III 上面的洞窟
196. 敦煌千佛洞 Ch. VIII 附近的洞窟
197. 敦煌千佛洞 Ch. IX 附近成排的洞窟, 有一些的门廊已倾塌
198. 千佛洞的王道士
199. 敦煌千佛洞 Ch. XII 窟北面相邻成排的小洞窟
200. 敦煌千佛洞 Ch. I 洞窟的主室与侧室, 部分已重修
201. 千佛洞 Ch. II 洞窟主室内的泥塑佛像, 带彩绘的头光及浮雕状的光轮等
202. 千佛洞 Ch. II 洞窟南墙壁画
203. 千佛洞 Ch. II. a 洞窟主室南墙及西南角壁画
204. 千佛洞 Ch. II. a 主室南墙壁画局部
205. 千佛洞 Ch. II. a 主室北墙壁画
206. 千佛洞 Ch. II 洞窟南墙壁画
207. 千佛洞 Ch. III. a 洞窟内带有泥塑佛的龕, 局部修过
208. 千佛洞 Ch. IV 洞窟内泥塑佛像(局部修过)
209. 千佛洞 Ch. III. a 洞窟北墙西方极乐世界壁画
210. 千佛洞 IV 洞窟北墙中央阿弥陀佛天国壁画(两侧小画面是阿闍世王传说和韦提希王妃 16 观)
211. 千佛洞 Ch. V 洞窟西侧壁龕, 龕内有泥塑残件
212. 千佛洞 Ch. VI 洞窟西墙上有泥塑佛像和蛋彩的壁龕
213. 千佛洞 Ch. VII 洞窟主室平台上的泥塑和西墙及窟顶壁画
214. 千佛洞 Ch. VII 洞窟甬道北墙一组比真人还大的蛋彩菩萨像
215.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甬道南壁壁画
216.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要东壁壁画 ii 下部画面及绘有系列女供养人及女侍的墙裙
217.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室东壁壁画 XV 及绘有于闐王和家人、侍卫带汉文题迹的墙裙
218.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室中央、西壁及窟顶壁画
219.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室西北角蛋彩壁画 ix、x
220.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室南壁蛋彩壁画 v, 系西天场景
221.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室西壁蛋彩壁画 viii
222.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室西壁蛋彩壁画 ix
223.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室北壁蛋彩壁画 xiii
224.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主室北壁蛋彩壁画 xi 及 x 局部
225. 千佛洞 Ch. IX 洞窟甬道南壁蛋彩壁画
226. 千佛洞 Ch. VIII 洞窟甬道南壁蛋彩壁画, 展示跟有行星占卜者陪从人员的佛车部分场景
227. 千佛洞 Ch. XIV 洞窟主室后人重塑的唐僧和随侍罗汉泥塑像
228. 千佛洞 Ch. X 洞窟主室佛龕内重塑的泥像
229. 千佛洞 Ch. XII 洞窟主室佛龕内泥塑佛像及四壁和窟顶蛋彩壁画
230. 千佛洞 Ch. XII 洞窟主室西北角蛋彩壁画
231. 千佛洞 Ch. VI 洞窟西壁蛋彩壁画(西天画面)
232. 千佛洞 Ch. XII 洞窟主室南壁蛋彩壁画, 上方为西天画面, 下方为行进中的军队
233. 千佛洞 Ch. XVI 洞窟主室西壁蛋彩壁画左半部分
234. 千佛洞 Ch. XVI 洞窟主室西北角墙壁蛋彩壁画
235. 千佛洞 Ch. XVI 洞窟主室北壁蛋彩壁画
236. 千佛洞 Ch. XVI 洞窟主室西壁蛋彩壁画的右半部分

第十四章 从罗布沙漠到敦煌

第一节 从阿布旦到敦煌的道路

2月11日,我那些在米兰遗址的民工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这天晚上我的营地又迁回了阿布旦。在那里我们辛苦工作了9天,对文物进行安全的打包,做各种准备工作。这些文物目前已在运往喀什噶尔(插图147)的途中了。

◁在阿布旦停留

1907年2月21日,我带着为了继续往东调查而准备的物资启程了。在我的个人笔记中,我对在甘肃最西部的绿洲中为期三周的考察作了详细说明。^① 这里有必要对沙漠地面的特征以及对道路的历史地貌的调查资料^② 作一个简明的总结。为了弄清我在这条路上调查中一些新提出的地理问题,我于1914—1915年冬天对这片渺无人烟的地区作了极为详尽的调查。^③ 但是,这些地形学调查结果仍有待于台拉登三角调查办公室(Trigonometrical Survey Office, Dehra Dun)出版。

◁路上的地理学观测

历史上连接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罗布地区与敦煌及中国最西部的直通道路,可能一直就有两条。^④ 其中一条可能要远一些,并要克服缺水和无法放牧的困难,但却可长年穿越阿尔金山(Āltin-tāgh)即“前山”的昆仑山脉东段光秃秃的高坡。在我的指导下,拉伊·拉姆·辛格和R.B. 拉尔·辛格分别于1907年和1913年对此路进行了调查,而且都已标在了地图上,这里就不必细说了。此路被罗布人(Lopliks)称为“山道”,另一条被称为“沙道”。“沙道”沿着北边是库鲁克塔格山(Kuruk-tāgh),南面是阿尔金山冰川似的山脚,顺着这条长长的洼地延伸到最深处。

在这里我们必须简要叙述一下“沙道”。根据不同特点,这块地方分成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总长约158英里的地区,它的南部与罗布湖盆一样长。从喀拉库顺(Kara-koshun)沼泽南部边缘开始,随后紧挨着一个目前已干涸的巨大盐渍湖床的南岸向前延伸。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我曾经提及这个湖床。^⑤ 在从阿布旦出发后第一个停留地墩里克,两条通往沙漠和山区的道路在此分开。在这里缺水的困难已经出现了,因为那条被称为阿其克布拉克(Achchik-bulak)(苦泉子)的小溪里的水是咸的。

◁通过喀拉库顺

再前进约55英里,越过干涸的盐渍湖床的无水地带,旅人便到达钦达勒里克(Chindailik)苦泉。目前这条商路再往前16英里,就穿越古罗布泊那凹凸不平、布满盐霜的坚硬地表(见地图64.A、B.2)。E. 亨廷顿教授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条小路沿着古老湖床堤岸的沙砾台地边缘延伸,因而避免了穿越困难重重的坚硬盐碱地。^⑥ 现在无法判断此路何时中断使用。但是,这条沿罗布泊湾行进的小路足以让人推测,历史上这里曾经有过一片难以逾越的盐碱沼泽,迫使道路拐了一个大弯。

◁古老的盐渍湖床

道路再往前时又是围绕着这些古代的湖岸线边的沙砾台地,并通往落瓦寨(Lowaza)(插图145)与科什兰孜(Kōshe-langza)之间那些可以得到虽有点苦但仍可饮用的水的歇脚点。科什朗扎前面,连绵不断的陡峭黏土地从南面消失了,道路继续分两路沿着巨大的盐渍湖床岸边的狭窄灌木地带前伸。这里的湖床表面非常平坦,一直向北延伸,好像湖泊依然存在。在潘家(Panja)和阿其克库都克(Achchik-kuduk)(地图67、68)驿站之间,这一带状地区的植被覆盖了一个盐碱沼泽带,成一干涸湖床上的点缀。^⑦ 从“苦泉子”(地图67,B.4)阿其克库都克往前,地表的自然特征变化非常明显,因此可以很恰当地认为这条道路的第一段就到此结束了。

◁湖床的古代堤岸线

在北面古罗布泊以远,我现在能看到最南面的库鲁克塔格山系最后的支脉耸立在仅仅约17英里以外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这光秃秃的低矮山岭平缓地向东北方向延伸。在道路以南不远处,有一条与之平行的、被巨大的流动沙丘覆盖的约400英尺高的山脊。这自然使人想起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时令河岸边的巨大沙岭。这里的沙丘地区也是在东北方向上,而它的底部是黏土。它同那些孤立或成片的高达40英尺或更高的侵蚀台地一样,从山脚向东北延伸。

◁古罗布泊的东部湖湾

① 参见《沙漠契丹》,第一卷,503~546页;第二卷,1~8页。

② 参见地图61、64、67、68、70、74、78。

③ 参见《地理学刊》,1916,第四十八期,126页以下,205页以下。

④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第五节,第十一章第十节。

⑤ 关于1914—1915年对此以北的考察,参见《第三次探险》,《地理学刊》,1916,第四十八期,126页以下(也可见《地理学评论》,纽约,1920,第九期,25页以下)。

⑥ 参见亨廷顿《亚洲脉搏》,290页等。

⑦ 我1914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古罗布泊底坚硬的盐壳状地表一直向东延伸并收缩成海湾,直达东经92°18'。因此,我自然就推测它比我们调查到的地方延伸得更远,如地图67、70所示。



拜什托格拉克沙
漠谷地

从阿其克库都克到拜什托格拉克(Bēsh-toghrak)以远,长达80多英里的道路所经过的地方明显地给人一个印象: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沙漠谷地,它的北面是库鲁克塔格,南面是阿尔金山沙砾石地带。1914年细致的调查以及两幅地图(地图70、74),更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特征。^①一系列精确测量的等高线尤其证明,这里的地表从库木库都克(Kum-kuduk)附近的最东边(我们的高程测量即以此为基准),开始缓慢但却持续上升,直到拜什托格拉克以远。^②在那里它与水源来自敦煌南面和东南面的古疏勒河盆地末端的一系列洼地相遇,从地理学角度看这些洼地很有意思。

沙漠谷地的地下
水

虽然这个目前已干涸的时令河盆地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它已经处在了这条道路的第二段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段道路是从阿其克库都克井几乎一直延伸到目前可能接受整个疏勒河水系水源的辽阔的沼泽盆地。这条路线超过96英里长的第二段特征,取决于它沿着一条大峡谷这一事实,而不是像上一段那样沿着已彻底干涸的盐湖岸。虽然这里仍是沙漠,但地下水足以在许多地点形成离地表并不深的饮用水水井,也可以维持或大或小的连片芦苇或灌木的生长。土壤已不再是盐渍壤或砾石,而完全是沙。过了央塔克库都克(Yantak-kuduk)之后,沙漠植被稳定地增多。远至拜什托格拉克,大多数地方只要挖下几英尺就会有清水。供放牧的芦苇和灌木从足够丰富,甚至还可以见到几株发育不良的野白杨,现在当地罗布人称之为“五胡杨”。从阿其克库都克继续向东北前进,谷地逐渐变窄。南边长长的沙丘带越来越逼近光秃秃的库鲁克塔格山脚,此山在这里高出谷底约1500英尺,而在拜什托格拉克,谷地的宽度已收缩至只有5英里。

拜什托格拉克的
水井古代疏勒河末端
盆地

直到拜什托格拉克,沙道的第二段上没有遇到前段上那些严重困难。不过,在拜什托格拉克的东边,地表特征有了明显的变化。从那里过了约5英里,有一处高达40~50英尺的沙丘带。过了沙丘带之后,这条道路就来到了构成疏勒河终碛盆地的一系列洼地的最西端。在我的个人笔记里,我详细描述了这里直到盆地东端附近一个地点的有趣特征。^③笔记里我还解释了由这些特征引发的特别有趣的地理学问题。^④

来自疏勒河水系
的地下水

这里的地下水很容易获取,这就足以使从拜什托格拉克至古罗布湖床尽头的谷地的交通线畅通。其水源很可能来自疏勒河水系某个部分的地下水道,一直流向早期盆地末端的洼地,至少在夏季泛滥时是如此。1907年和1914年我都清楚地观察到了其中一些最近的泛滥痕迹。同时在一个很广的范围内,土壤仍然比较湿润,很少见到盐壳,这显然说明水到达这里时还相对地较淡,而且在完全蒸发之前就已渗入地下。^⑤

多变的末端盆地

这条路(沿着这古代盆地末端前进或穿越它)经过的地表是相当多变的。不管是在洼地中松软的沙土上,还是在宽阔的沙丘带上,都找不到一条能由一个季节沿用到下一个季节的旅行通道。在这个辽阔盆地的大部分地区(插图148),数以百计的黏土台地成群或成排、像岛屿或高塔一般在其间^⑥,星罗棋布,使得行人很难找到正确的道路或者走对方向。如果没有向导,过路人可能很容易在这些奇异的黏土带“迷宫”中迷失方向,误入盆地南部或北部毫无生还希望的沙漠中的不毛之地,那里荒芜的台地或沙丘宛若一道大幕挡住去路。

疏勒河末端河床

我们第一次从拜什托格拉克出发的旅行,就到了上述奇异盆地的东端附近。我们的向导没能找到可以宿营的苦井。不过在第二天即3月7日早晨,我们在道路已经很好找的粗沙和砾石地区只行走了约3英里,就来到了从东边延伸过来的边界深切清楚的洪

① 参见《地理学刊》,1916,第四十八期,129页。如地图67、70所示,上述主要地理现象一点也不受已被调查证实了的从阿其克库都克到央塔克库都克附近的道路走向的重要地貌细节的影响。长满灌木丛和芦苇的盐碱平原只延伸到道路以北不足2英里的地方,在那个边界以远则是上面提到的古罗布泊最东边的延伸部分,那是完全草木不生的盐渍地表。在一些地方,这个延伸部分的底部仍保持着盐碱沼泽的状况。我们发现,它的最东端延伸了约2英里,直到央塔克库都克北面东经92°18'处(地图70.B.3)。

② 从库木库都克以北到拜什托格拉克以远洼地的西缘线60英里范围内,最高处正好高于基准线250英尺。

③ 参见《沙漠契丹》,第一卷,532页以下。

④ 这里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性,促使我1914年3月路过时作了更深入的调查。调查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我以前对这里的一般特征的说法,同时也使我对现在在地图74.A.3中所见到的一些地方的细节作一些修正。它们已及时反映在新的系列地图里,包括我第三次旅行及以前探险的成果。在这些细节当中,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更正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

1914年3月,R.B.拉尔·辛格在我的指导下,带着平板仪对上面描述的洼地地带的南部进行了调查。证明地图74.A.3中所标的此路向北拐向现在的疏勒河末端的转折点是不对的,水从此可以最终到达153号营地南部也是不对的。拉伊·拉姆·辛格1907年5月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踏勘,非常准确地划出了疏勒河从174号营地至地图上SU点的走向。但是,他也没能发现河床向北拐的真正地点,而只是向西南划了一个直拐。河水1914年从此继续向西约4英里,注入一个南北长约7英里、以盐渍带为岸的狭窄的湖里。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它很可能与地图70.D.4上所标的再往南的湖床相通。

在地图上我们看到,那个高耸的沙覆高地一直延伸到疏勒河向北拐弯处(这个点实际上标错了)的北面。事实上它一直向正西方向延伸,并与从地图74.A.3延续到地图70.D.3上的那道山脊相接。在这两份地图上,山脊的走向与事实相符。《沙漠契丹》第一卷535页(上端)的表述也应相应予以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中间这片高地的长度和宽度使疏勒河水系更有可能找到了它通向现在通常已干枯的三角洲北部河床的通道。而不是像想像的那样,在从终碛盆地南部向前流淌过程中渗到了地下。我1914年在盆地北部作了调查,而且收获颇丰。

要公正地评价我的调查助理的上次调查,我应该补充说明,他的错误部分是由于地表本身带有欺骗性特征,部分是由于他的调查是在不适合调查的气候环境下进行的,而且那时他的身体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⑤ 疏勒河的洪水甚至现在也能在这早期盆地里找到它的出路,要么通过蒸发,要么通过其他途径。这可由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干枯的河床一直延伸到目前的疏勒河末端,进而成为它的三角洲的一部分。

⑥ 毫无疑问,它们是侵蚀的“见证者”,同时它们在哈拉湖(Kara-nōr)周围及南面的疏勒河终碛盆地附近也有发现,有力地证明拜什托格拉克东边这条道路经过的洼地具有湖泊特点。

水河床边。我立即意识到我们已经到达了疏勒河古老的末端支流的一个分支,我继续向前来到它右岸的峭壁,发现地面突然完全改变了面貌。它的东边是一片偶有几处洼地的开阔沙砾平地,北边远处是库鲁克塔格山的低矮山丘。这里的天空不够明朗,无法看清安南坝乌拉(Anambar-ula)巨大的雪山,而往后的季节则是能看见的。显然,这条道路很可能从这里起已经进入了非常开阔的疏勒河谷地,并已接近构成终碛盆地的沼泽地带。它的边缘离我沿这条道路来到的沙砾高地只有6英里左右。

我们已经穿越的地区确实是一处古老的终碛盆地,而且经过它及拜什托格拉克以远的谷地,疏勒河水早期(不过从地质学上来说并不久远,只是在罗布泊干枯之后)从此处流向古罗布泊。但是,接受这个理论无论如何也不会淡化这条道路由此进入它的第三段,也就是最后一段的印象。这段通往敦煌大绿洲这个中国通向新疆最西端的前哨阵地,以及最早经营中亚地区基地的道路总长约97英里,共有5个便利的驿站。这整段顺着中国古代路线的道路,通向疏勒河床附近,或其他水源来自敦煌水系的淡水泻湖带。由于淡水水源充裕、一些很便利的空地上适合放牧,沿线四季都易于通行。虽然这里还不能耕种,但是河边地带很多地方都适合放牧,因此行人开始感觉到真正的沙漠已经甩在身后了。

我随后沿着罗布—敦煌路线这最后的河边地段(即中国古代长城的最西段,也就是曾经捍卫中华帝国声威的“中国墙”真正的末端)进行了调查,丰硕的调查收获证实了这一明显的地理变化。由于取得了丰硕的考古学成果,因此这些探险与考察活动将在本章及以后的章节中得到详细的阐述。不过在此之前,我将首先对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整条路线的地志学资料作一简要的回顾。

◁前往敦煌的道路的最后一段

◁沿着古代中国长城延伸的道路

第二节 罗布沙道的汉文记载

在第九章讨论罗布地区的中国历史记载时,我有机会详细研究了讨论中国贸易与政治势力最早向塔里木盆地扩展时经常用到的主要地志学资料。^①我阐述了这段那时新开通的,由敦煌的中国前线基地通往罗布泊附近楼兰境内的道路,曾经起到的重要作用。这里我不打算重复阐述证明下面结论的证据:在著名的张骞通西域事件(公元前136—公元前123年)之后,所有通往塔里木盆地的交通、贸易、军事行动,都肯定主要是经过这条通往干枯的罗布湖床北部(即以楼兰遗址为标志的、目前已完全干涸的那部分罗布地区)的道路。我也不想描述1914年冬天从这些遗址开始的、困难重重却也收获颇丰的考察活动。在那次调查中,我把这条古道与目前从罗布到敦煌的沙道的相交点以前的那部分弄清楚了。我在其他地方对此所作的初步说明,现在足以用作参考。^②由于早期资料有限,我打算简要讨论一下现在能查找到的有关上节讨论的道路的所有地志资料。

◁道路的早期历史

在前面讨论《汉书》中有关鄯善即楼兰的资料时,我曾详细讨论了书中所提供的,有关从敦煌到楼兰道路的虽不丰富却很重要的材料。在那里我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和现在一样,那时为了寻找通往北部广阔的绿洲带最直接的通道,并开辟由西向东越过塔里木盆地最便捷的军用、商用通道,中国人最初把主要道路修在那时仍可居住的罗布地区的东北部,这里因此留下了曾作为他们窥视古代罗布湖床以远地区的桥头堡的楼兰遗址。^③当这条道路首先沿着这片广袤的盐碱荒地的边缘走过之后,便从它最狭窄的北部穿过。这里的自然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但是,在远未到达通往古代罗布泊南岸的道路之前,这些困难就可以从南部广大地区的补给中得到缓解,而且中国军人与商人可以从附近的农耕区得到各种给养。我们的一份略图显示,楼兰遗址(L.A)与拜什托格拉克之间的距离,要比它与米兰近将近70英里。

◁经过楼兰的直通道路

1914年我正是在这条我们为行文方便而称为“楼兰道”的罗布—敦煌道路的北支线上,正确地确定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白龙堆”(White Dragon Mounds)的位置。《汉书》把它定在离中国最近的楼兰国领地的最东端的对面^④,以后也都沿袭这种说法。^⑤在我1914年考察结果的初期报告中阐述的重要考古学“发现”,促使我沿着楼兰道继续对“白龙堆”两边的最西端荒芜地段进行调查。这里的遗迹似乎可以比东段更准确地进行调查。根据地理学和考古学证据,可以肯定地说,这条道路是沿着以中国古代长城为标志的一线,也就是我上面介绍的目前通行的从罗布到敦煌沙道的第三段的延伸。我正是在那里发现了著名的玉门关遗址。《汉书》把它作为楼兰道的起点。^⑥

◁已探清的“楼兰道”

在古代楼兰道的中段,我们也有可靠的向导。我1914年的探险证明,尽管由于盐沼地表面干燥而难辨真伪,但是古代湖床最东边的一些遗迹仍然一直延伸到相连的央塔克库都克(地图70.B.3)。再往前则可以看到,这个地点的东边,在我为行文方便而称之为拜什托格拉克谷地的北缘,可以找到水及养驼的牧场。它的北缘当然也就是通往楼兰最近的路线。因此我说,沿此线通往楼兰的汉代古道,在目前沙道上拜什托格拉克附近的某个地点分岔。我有一些考古学发现支持这个结论,只是这些发现必须在我第三次考

◁楼兰道的中段

①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四节。

② 参见《第三次探险》,《地理学刊》,1916,第四十八期,124页以下。

③ 关于我1914年在楼兰遗址东北发现的,中国在楼兰方向设立的最早据点L.E遗址的位置及性质,参见《地理学刊》第四十八期,124页。在此页所附的临时概图中,这个据点的位置标在接近沙漠入口D附近。

关于向东前往拜什托格拉克的古代道路,这份概图也是很方便的参考资料。但是,除了比例尺缩小了之外,我们还要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份概图只是在天文测量和三角测量结果出来之前为临时使用而编绘的。

④ 参见怀利(Wylie)《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人类学学会会刊》,第十期,26页。关于我1914年对“白龙堆”位置的确定,见《地理学刊》,第四十八期,128页;本书第九章第五节;而《沙漠契丹》第一卷525页上的说法则应相应地予以修正。

⑤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本章第二节。

⑥ 参见本章第二节及第十九章第一、二节。



察报告中全部重新整理。^①我们可以肯定,汉代的道路在拜什托格拉克以东是沿着或穿过上面讲到的终碛盆地的东缘前进的,而不是沿着现在的路线。因为如地图 74.B.3 所示,这条路上矗立着中国长城的早期烽燧 T.I 和 T.II,而且长城深入到盆地东南边缘以内 8 英里,从而形成一段直线的长城,这足以证明它的年代相当久远。

西段的困难▷

在 1914 年冬天的调查中,我成功地找到了通过那片尽是盐碱、黏土、沙砾的不毛之地的古代楼兰的西段。而从我在其他地方对那次尝试的说明,将足以证明这里所遭遇的困难是多么难以克服。^②在古代,在至少 120 英里之内,既没有水,没有牧场,也没有燃料。至于汉武帝时期交通线路的组织者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开通这么一条重要的军事、贸易交通线,我不能在此加以讨论。但是,我可以记录一个关于地形性质的观察结果。毫无疑问,这种性质可能使整条楼兰道用于交通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中国人至今前往中亚及其邻近地区时仍喜用的一种交通模式。从楼兰遗址发现的汉文文书中可以发现这种记载^③,而我在其他地方的经验则让我相信,根据文书可以找到一些古代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

通往鄯善的南支▷
线

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通往米兰和阿布旦的道路的南支线,在那里马车道虽然简陋,但也没有太大的困难。在此线西段,缺水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在阿布旦和落瓦寨之间约 94 英里的路上,除了 12 月至 4 月间有苦泉里的冰可用之外,其他时间得不到饮用水。我们将会看到,早在马可·波罗路过这里时,缺水的困难就已经存在。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这里在汉代水比现在要更充裕,而此后的干旱过程可能是由于落瓦寨西边的泉水逐渐碱化而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在历史时期此路南支线上的自然障碍,从来就不像北支线即楼兰道那样不可克服,路上的每个驿站都有中型牧场,也有燃料供应,马可·波罗就曾提到过这个情况。因此,虽然我并没有找到南支线早在汉代就已开通的直接证据,但我仍然相信,这条直通米兰和若羌(Charkhlik)等地的古鄯善遗址的支线,在中国早期与塔里木盆地交往时即已投入使用。^④

《魏略》中记载的▷
通往楼兰的道路

在公元 1 世纪,通向楼兰的北线很可能仍是中国与敦煌以西地区进行交往的主要通道。但是,《后汉书》提到这条通往鄯善的道路时,除了提到它始于玉门关之外,并无其他任何细节。^⑤幸运的是,我们从成书于公元 239—265 年间的《魏略》中,找到了三国时期敦煌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的记载。在讨论楼兰遗址的地志资料时,我有机会探讨了这些经沙畹翻译及详细注释的文献资料中,反映出的这些有趣的信息。^⑥在那里我整段引用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段落,它表明《魏略》里的“中路”正是我们所说的楼兰道。它始于玉门关,经过拜什托格拉克谷地,到达古罗布湖床,越过罗布湖床,便直抵曾经可以居住的楼兰地区东北边界。但是我们仍需根据目前我们对这条道路通过的地区的调查,对文献中所记载的各个中等驿站地望进行详细考证。为便于参考,这里我再次引用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段落:“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并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魏略·西戎传》)

始于玉门关的道▷
路

遗憾的是,《魏略》没有说明上述各地之间的距离。但是,即使没有文献上的参考资料,根据我们对道路起点和终点的准确了解,我们仍可对这些地名所指得出一个较为可信的结论。我们下面将要阐述的,对长城烽燧 T.XIV(地图 74.D.3)的发掘所获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考古学证据,^⑦使我们得以准确地认定此路的起点玉门关的位置。至于“都护井”,在下面我将有机会说明,它极有可能位于以烽燧 T.IV.a、b 为标志的长城的最西端。^⑧此路“回三陇沙北头”,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信息。根据我对这里的调查,我敢肯定,它指的是这条路紧邻拜什托格拉克东边的那一段,也就是上面讨论的此路第二段的末端。从地图 74、70 可以看出,它途经古老的疏勒河终碛盆地,有时它绕着拜什托格拉克谷地南面高沙丘的最北端的分支迂回前伸,在一些地方则是越过它们。这个沙丘带现在和以前一样,只是包括一连串连绵不断的流动沙丘中的小沙丘。这些流动沙丘向上延伸到阿尔金山(Altin-tagh)较高的安南坝乌拉部分的广阔沙砾缓坡前(地图 75.A~D.1),在更西边为已干涸的罗布湖床南部(即罗布人称为库姆塔格[沙山]的高耸的沙丘地带),也发现了它们延伸过来的现象。^⑨

“三陇沙”▷

拜什托格拉克东▷
边的沙岭

从这份略图(即地图 75.A~D.1——译者)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片大沙漠的北部边缘,由像岬角一样突入上述盆地里的低矮沙岭构成,同时道路也穿过了这里。我们很有把握地将“三陇沙北头”的位置确定在那里。这一认定还可由《魏略》中关于此路转向的记载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其中说到此路回到这个地点。循着地图上所画的路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离开长城西端之后,此路几乎直线向西北前进,直抵离拜什托格拉克最近的岬形沙丘,在那里折向西南,与拜什托格拉克谷地的大方向一致。

三陇沙地名的由▷
来

文献中的用词与地貌特征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我必然要试图把三陇沙(三道沙岭)之名,与此路事实上穿越的南部高耸沙山前三道明显的小沙丘或岬角形沙垄联系起来。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三道沙岭在 153 号营地(地图 74.A.3)与拜什托格拉克谷地的起点(地图 70.D.3、D.4)之间的道路旁平缓延伸的状况。这里的地貌特征本身一定曾给中国古代的过客留下过极为深刻的印象,

① 关于我在科什库都克(Kosh-kuduk)以西、拜什托格拉克北缘发现的一条古代水道遗迹(地图 70.B.3),参见《地理学刊》第四十八期,129 页。

② 参见《地理学刊》,第四十八期,127 页以下。

③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及赫定《中亚或西藏》第二卷 143 页等。

④ 《汉书》中对此的说明,见本书,第九章第五节。

⑤ 参见沙畹《后汉书》,《通报》,1907,166 页等。

⑥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沙畹《后汉书》,《通报》,1905,528 页以下。

⑦ 参见本书,第十九章,第一、二节。

⑧ 参见本书,第十七章,第一节。正如沙畹已在《通报》(1905)529 页他的译作中友好地对我指出的那样,这一地点的名称应误作 'le puits du Protecteur général'。

⑨ 有一幅简略的地图很好地反映了这片广袤的流动沙丘的地形,它在东经 91°至 94°之间沿着阿尔金山山脚延伸。赫定博士 1901 年 2 月沿着从安南坝(地图 75.B.3 上的罕阿姆巴[Khan-ambal])到拜什托格拉克(他称为托格拉克库都克[Toghrak-kuduk])东边干燥的终碛盆地的一个点,从南向北穿越了这一地带。详细情况参见赫定《中亚》,第二卷,86 页以下。



因为楼兰道只有在这里才被真正的沙丘越过。在我看来,这三道沙岭似乎都不超过 40 英尺高,因此像我在其他地方所见到的,马车是完全可以通行的。但是,根据我的经历,我太了解现在人畜在这样的沙漠中旅行所要遇到的障碍是何等难以克服。对于这些迂回曲折的沙岭是何等引起古代过客的注意,以及他们为何在当地人的地名命名法中找到一个恰当的名字,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白龙堆”指直抵楼兰道西端的那些难以逾越的布满盐霜的台地地带^①,这个生动贴切的名称,也足以证明路过这些荒凉沙漠的早期中国人对这里独特的地貌特征是何等关注。

《魏略》所载路线上的这个点的位置确定之后,就有可能确定它前面的都护井以及它后面的居卢仓的位置。前者表明,这里有足够的牧场,而且从泉和井里可以得到淡水。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由烽燧 T. IV. a、b(地图 74. B. 3 及附图 33)所护卫的长城最西端角上的洼地,可以为来往于这条受到保卫的边境线上的商队提供一个十分方便的歇脚点。我下面对这个地点的叙述表明,我发现了一处看来是大型环壕营地的遗迹,它的年代很可能早到这条道路刚开通、保卫它的长城刚建起来的时期。^② 可以肯定的是,这条路上的玉门关(T. XIV)与拜什托格拉克之间,没有一个地方能有与这里类似的可以提供中途歇脚点的便利条件。

居卢仓可能是楼兰道开通时建立的诸多早期“给养站”之一,它有可能位于拜什托格拉克。长城以西的任何其他地点都不具有比这里牧场充裕的优势,今日也是如此。由于正好在楼兰道的一段艰难路段的前面,拜什托格拉克就成为补充给养的基地的绝佳地点。但是,我没能找到任何遗迹来对此提供考古学上的支持。同时,考虑到地下水离地表很浅,以及土地中含有大量盐碱的地貌性质,所以土坯或者仅仅是黏土在废弃许多世纪之后没能保存下来。像我自己一样,凡是见过安西至哈密沙漠道路上用作中国“酒店”或士兵营房的简陋泥糊小棚的人,没有谁会怀疑它们在 1000 年时间里会完全消失,更不要说是在弃而不用之后。它们也能基本满足交通的需要,虽然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要比楼兰道全盛时期清闲多少。

关于沙西井的位置,我们可以从那段记载中此路折向西北一句话,得到极为有益的启示。我 1914 年调查时发现,此线在古楼兰道前面。因此,根据《魏略》的记载,此路显然把我们引向它从库鲁克塔格最后一处小沙丘向西南的转弯点附近,在这里向北可以看见拜什托格拉克谷地。从地图 67 上可以看出,这点对应的是东经 91°32'、北纬 40°23'。像我调查时找到的一样,这条古代路线在那里向北急拐弯,并沿干枯的古罗布泊岸前进,直抵此路穿越以“白龙堆”为界的盐渍湖床的那个点上。^③ 我 1914 年在与此相对的方向进行探索时,从那里向东北行进约 12 英里后,来到了库木库都克西北界定古代海床东延部分的黏土台壁脚下的第一处现存植被带。^④ 再向前行进约 3 英里,我们成功地在土壤已变成沙性的地方挖出了一口井。尽管井里的水甚至对骆驼而言都太碱,但是能挖出这口井表明,在早期(那时沙漠化还没到这么远)对应于《魏略》所记“沙西井”的那个能找到饮用水的“休憩地”,可能就在拜什托格拉克谷地西端附近的某个地方。^⑤

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根据《魏略》对楼兰道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因为我们已经考证了龙堆(Long-tui)驿站遗址就是《汉书》中说的“白龙堆”,而“古楼兰”也就是楼兰遗址。^⑥ 我们也已经看到,楼兰地区是如何在它见诸记载之后一个世纪之内最终废弃,并变成沙漠的。由于水和耕地的消失,古楼兰道在 4 世纪前半叶之内已经变得难以通行。自从汉武帝为了向西扩展而开通之后,它已持续沿用了 450 年。但是,由于公元 1 世纪初开通了那条《魏略》里所说的“北新道”(通往天山东部,并且可能通往哈密附近),古楼兰道的重要性显然大不如前了。^⑦ 甚至早在它最终关闭之前,中国与西域的联系已经少多了,而且对塔里木盆地的政治控制也开始受到干扰或者完全失控。

自东晋(公元 317—419 年)至 7 世纪初唐朝建立,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的持续衰退,反映在中国正史中完全没有对连结中国与“西域”的道路的记载。好在还有中国僧人(其中最早为人所知的是法显)前往印度取经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段空白。这些记载尽管简略,但我们还是据此对敦煌至鄯善即罗布的沙漠道路有些书面上的认识。虽然有必要把它与罗布地区的历史联系起来考虑,我这里还是很方便地再次引用这段记载。^⑧

法显及其同道于公元 400 年秋抵达敦煌。很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这个地区被描述为“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可四十里”。这表明那时候这个主要绿洲里的耕地,并不比近代(见地图 78)大多少。这也可能说明,向西延伸很远的古代中国长城线上的驿站,那时也已废弃不用,而我调查所得的考古学证据也支持了这个观点。法显在敦煌停留一月有余,和其他四个僧侣开始了“使者代表团”

①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五节;《地理学刊》,第四十八期,128 页。

② 参见本书第十七章第一节。现在的过客通常的歇脚点在疏勒河岸东北方向约 3 英里远的托格拉克布拉克,也就是我的 154 号营地。但是,由于邻近的高原上都是草木不生的沙砾土,因此这里缺乏牧场,所以如果有许多商队路过这里,就不能提供足够的车马、给养。

③ 参见《第三次探险》,《地理学刊》,第四十八期,129 页那篇文章所附临时概图可以帮助说明这条古道从上面讲述的库木库都克西北那个地点往前时走向的变化情况。

地图 67. A. 2 和 B. 3 对那个地点往西北的矮丘带的划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1907 年从很远处看到的高地,从更近处调查时发现属于平行而并不连着库鲁克塔格山系的西端。从那里开始,它们逐渐变矮,直达宽阔的海底盆地东岸。

④ 关于古代岸线附近地表的景观,见上注那篇文章中的插图 13。

⑤ 这里的地貌特征是否有可能表明这个站就是沙西井呢?这可能从“沙(漠)西(端)”的字面意义得到解释。文中提到的地方显然就是覆盖拜什托格拉克谷地的低矮流动沙丘向西延伸的尽头。从此处往前,现在在古道上再也见不到流动沙丘了,直到楼兰遗址所在的地区。

⑥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五节、第十一章第十节。

⑦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十节以及第十九章第六节;沙畹,《通报》,1905,533 页,注①。

⑧ 参见莱格《法显》11 页等以及本书第九章第二节。我把中文名字按韦德氏体系(Wade system)翻译过来。



之行。“敦煌太守李暹供给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法显传》)历时 17 天、行程约 1 500 里后，他们到达鄯善王国。

法显去若羌所走的路

由于那时楼兰地区已经荒芜，我想那些僧侣所走的路很可能是通往米兰和若羌的。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条路并不是沿着阿尔金山上的高地前进，而是穿越敦煌与罗布之间的沙漠洼地。我以前的地形调查已经说明，在历史上从敦煌到米兰或阿布旦，大部分地区不可能再有其他可通行的道路。这个结论与法显对他们旅行所经历的自然条件及旅途路程的叙述是一致的。他 17 天的行程正好与我从阿布旦至敦煌绿洲的 17 段路途完全一致，只是我多休息了两天。同样，他所估算的 1 500 里，正好相当于我所估计的总长 380 英里左右的路程。这样，根据他们印度之行的记载，可以估算出四五里相当于一英里，由此也可以估算出已确定的每两个停留点之间的距离。

裴矩对南线的记载

据我们所知，宋云是继法显之后第二位访问过罗布地区(公元 519 年)的僧人，但他并不是像我们上面所讲的从敦煌出发，而是穿越柯柯盐湖(Koko-nor)地区和柴达木盆地。^①裴矩于 607 年根据在甘州收集的资料，编纂了一部关于西域的有趣的著作(《西域图记》——译者)。里面确实提到鄯善即罗布是三条西行道路南面的早期领地。^②然而这似乎并不能说明，这条路已经到达了这里。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最了不起的僧人玄奘 645 年冬天从印度回国时走过的从米兰到敦煌的那条沙漠道路。遗憾的是，他自己的旅行记《西域记》(即《大唐西域记》——译者)只记到他抵达纳缚波境内。纳缚波“正是古楼兰国”，像我们上面提到的，它也就是罗布。^③

玄奘穿越沙漠之行

玄奘显然认为，他回国途中经过的这些地区，是在中华帝国疆域之内。自他 630 年按唐太宗的旨意开始“西天”取经之行时起，这些地区就开始雄心勃勃地向西扩张，因此他并未把这些地区的情况写进他的书里。但是从他的门徒慧立和彦棕为他写的传记中可以看到，玄奘事实上是在穿越了罗布至敦煌即沙州的沙漠之后才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段旅行。^④玄奘在和田收到了唐太宗回复他回国请求的信，这封信已收入了他的传记里。这封信明白无误地指示敦煌行政长官引导他，穿越满是流动沙丘的沙漠。

唐代前往敦煌的沙漠之路

这条连接敦煌与罗布地区的沙漠之路，在唐代极有可能仍在在使用。但是根据《唐书》(沙畹很热情地给我看了它的译本^⑤)记载，敦煌至和田的路线始于阳关。因此，根据进一步的调查^⑥，我认为它指的可能是沿阿尔金山至米兰的路线。遗憾的是，在我和伯希和^⑦从千佛洞收集的写本中，没能找到有关敦煌地区地理概况的资料。

唐统治之后敦煌至罗布的道路

正如我上面指出的，在米兰确实有一处吐蕃要塞。这足以证明，8 世纪末前后，当中国的政治影响在塔里木盆地完全消失之后，敦煌至罗布地区的各道路的重要性并未降低。^⑧从后晋到北宋末年(936—1126 年)，中国正史里不断有一批批和田使节朝见中央王朝的记载(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过这一现象^⑨)，这似乎证明，罗布和敦煌之间的直通道路在唐朝覆灭之后很可能仍在在使用，至少是时断时续地使用。但是我们只在沿阿尔金山高坡上发现了一段可以确定的道路。^⑩

第三节 马可·波罗及此后罗布沙漠之路上的旅行家

马可·波罗路过沙州(Sachiu)

文献中再次出现沙漠之路使用情况，已是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事了。这就是马可·波罗 1273 年前后从“罗布镇”来到“沙州”，他对这条道路的许多生动描述引起了我们特别的兴趣。我们已经追随这位伟大的威尼斯旅行家的足迹到达了罗布镇，而且证明它就位于今日的若羌。^⑪这就是他的不朽名著对他跨越沙漠的旅行的描述^⑫：“凡行人渡此沙漠者，必息于此城一星期，以解人畜之渴。已而预备一月之粮秣，出此城后，进入沙漠。”

沙漠之路的描述

“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达彼端。狭窄之处，须时一月，方能渡过。沿途尽是沙、山、沙谷，无食可觅。然若骑行一日一夜，则见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饮。甘水为数虽不多，然全沙漠中可见此类之水。质言之，渡沙漠之时，至少有二十八处得此甘水，然其量甚寡。别有四处，其水苦恶。”

①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二节。

② 参见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 530 页的注。他引用了纽曼(Neumann)的《亚洲研究》一书中 187 页以下(1837 年)中的资料。

③ 参见本书第十章第二节；朱利安《记》，第二卷，247 页；沃特斯《玄奘》，第二卷，304 页。

④ 参见朱利安《生平》，288 页、290 页；比尔《西域记》，210 页、212 页。

根据法国人翻译的资料，玄奘在纳缚波换上了和田王提供的马和骆驼，他用这些牲口拉车回到了敦煌。但是，要确认玄奘是否真的使用了马车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⑤ 参见本书附录 A，II(引自《唐书》第四十三章 b 部分)。

⑥ 参见本书第十六章第四节。

⑦ 参见 L. 吉尔斯博士的文章《敦煌录》，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14，703 页以下；伯希和文《亚洲学刊》，1916，1—2 月号，111 页以下。

⑧ 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

⑨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

⑩ 参见雷米萨《和田城》，74 页以下；《古代和田》，第一卷，178 页。

⑪ 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

⑫ 参见尤尔《马可·波罗》，第一卷，196 页以下。



“沙漠中无食可觅，故禽兽绝迹。然有一奇事，请为君等述之。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或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欲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使其失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甚至日间亦闻鬼言，有时闻乐声，其中鼓声尤显。渡漠情形困难如此。”因此，在这样的旅途中，人们通常保持很近的距离。所有牲口的脖子上都挂着铃铛，不使它们轻易走失。睡觉的时候，则在附近立一个标志，指明下一段路的方向。

◁马可·波罗对沙漠鬼怪的描述

马可·波罗在下一章的开头紧接着写道：“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毕，抵一城，名曰沙州。此城隶居大汗(Great Kaan)。全州名唐古忒(TANGUT)。”^①

如果我们首先讨论马可·波罗这章开头部分所描述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说明，马可·波罗对自己跨越“罗布沙漠”之行的记录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路线之间有着密切的一致性。在1906年12月第一次停留若羌收集有关敦煌路线的资料时，我确信，从和田于田出发，习惯于沿此道前进的商人，通常都作一整月的时间预计，而且带着满负荷的牲口。考虑到他们那些用于运输的骆驼或驴，在旅途上的库木库都克与拜什托格拉克之间(地图67、70)和我的155号营地与176号营地之间(地图74、78)的路段上，商人们把每天的行程定得稍短一些。因为不需走太远就有水和牧场；或者，如果牲口的身体条件好，他们可能会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停上两三天，然后一次行走两段路途。我们随后的调查证明商人的估计是正确的，同样也清楚地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非常准确的。

◁现代商业旅行

经最后核对、修正的平板仪的调查显示，把若羌到米兰(从墩里克到米兰的距离与从阿布旦到那里的路途基本相当)的行程包括在内，从若羌即马可·波罗所说的“罗布镇”至他所说的“沙州”，也就是敦煌，共397英里。根据马可·波罗在下一章所说的情况，如果我们把整个沙漠中的行程分成30天，那么平均每天的行程大约就是13英里。鉴于这条路线上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环境恶劣，这个每日行程平均数对于熟悉中亚的这部分地区情况而且有骆驼的人来说是合乎情理的。事实就是如此，经过特别的努力，或说相当于一连串的急行军，我们才用了19天时间从阿布旦到达敦煌，其中包括2天休息，3天从若羌到阿布旦。但是此前我特意安排我们自己的牲口休整了约6周，而且在路上把它们负担降到最低，还用了一些备用的驴来运货。即便如此，一些驴也倒下了。因此，我非常怀疑，有哪支大型商队能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旅行，而又没有牲口严重减员的风险。^②

◁一个月旅途的估算

上面我曾对这条道路的前两段作了一个简要说明，在《沙漠契丹》第四十五至四十八章中有更详细的说明。这些材料足以证明马可·波罗早已准确地描述了旅行者在这条沙漠之路上很可能要遇到的水、牧场及其他方面的自然条件。在“沙、山、沙谷”一段里，我们已了解到了沙漠之路整个第二段的路旁巨大沙丘给人留下的印象。我们的经历表明，这段路上有四个地方，要么没有水，要么水太咸无法饮用，与马可·波罗所说的“别有四处，其水苦恶”^③的地方完全吻合。同样，他所警告的其他可用水源有限的地方，也由我们发现的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得到了很好的证实。从我上面所提到的路段数量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证据来推翻马可·波罗“至少有二十八处得此甘水”的说法，这证明“甘水”一词并非完全是文学语言。

◁对自然条件的描述

我们现在对于罗布地区南部与敦煌之间地区主要地貌特征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确信，在历史上，往返于两地之间的商队除了现在仍在用的那条路之外，并无其他直通道路可供他们选择。它不仅是通往疏勒河下游最近的路线，而且很明显，不论是北部干燥的罗布湖床盐渍荒地，还是南部库木塔格高高的沙岭上，都不存在马可·波罗描述的成片有水源和牧场的地方。一旦明白了这一主要地貌现象，我们就不必对诸如“为何马可·波罗从未提及罗布泊”这类问题进行想当然的解释。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往往把这位古代旅行家的说明与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罗布泊问题”^④联系起来，寻求答案。尽管在“他的兴趣范围”内，马可·波罗是了不起的观察家，但他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他对他可能从墩里克遥望那些沼泽只字不提，对他后来可能在近处看到的草木不生的盐渍荒地只字不提，远不如他对他从莎车(Yarkand)至若羌长途旅行中，近在咫尺而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巨大的昆仑雪山只字不提让人不可思议。

◁马可·波罗走上现在的道路

◁马可·波罗对罗布泊只字未提

我们也不必详细讨论马可·波罗对“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的说法。我们已经提到过，他非常细致。他根据其他有关人的估计来修正自己的估算，并且轻而易举地意识到他的蒙古人或者说突厥人向导像现代中国人一样，在最大范围内用“戈壁”一词。^⑤对他们来说，从蒙古东北到西藏西部这一没有永久农耕聚落的广袤地区早已了然于胸。同样的意见，也适用于他进一步对沙漠地区危险性的说明。

◁“戈壁”的范围

我没有必要沿着他事实上走过的路线旅行，我平日接触的人也没有死守着他那些中亚地区同行者的观念。我也不必以此来证明，他的书中一件与大沙漠有关的怪事，只不过是他在那个地区听来的，这是古老民间信仰的真实反映。亨利·尤尔很早就在他对这段记录的评论中说明，害怕被妖怪引入迷途的心理，总是萦绕在所有那些早期穿越中国与西部绿洲之间的沙漠荒地的旅客心中。^⑥上文所引法显的话，明显指的就是这一心态。玄奘则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记录了他在民丰与且末之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穿行给

◁出没于沙漠的妖怪

① 参见尤尔《马可·波罗》，第一卷，203页。

② 1906年冬天，布鲁斯上校(Col. Bruce)的考察队在前往敦煌的路上的遭遇，很有力地证明这种风险的存在。参见布鲁斯《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In the Footsteps of Marco Polo)，182页以下。

③ 我们发现其中的三处位于阿布旦与落瓦寨(142~144号营地，地图61)之间，第四处位于我们的153号营地(地图74)。在上面提到的最后一处营地，同时也可能离143号营地(地图61.B.2)很近的地方，我们甚至现在也能在深井里发现水；但水可能很咸。当然，从干燥化或其他过程可能影响地下水系变化的细节的角度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同时马可·波罗所提到的四个含有咸水的地点也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

④ 参见尤尔的《马可·波罗》第一卷199页上的一个很长的注释；另参见《地理学刊》，1898，6月号657页等。

⑤ 关于这一术语在沙漠方面的用法，见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24页的注②。

⑥ 参见尤尔《马可·波罗》，第一卷，201页等。



他留下的印象,从而也印证了这一心态。^①

马端临对沙漠之
路的关注

关于穿越“罗布沙漠”的旅行者这种恐惧心理,其盛行年代之久的明显证据来自马端临的巨著《文献通考》——译者)。其中有一段话写到了从中国到焉耆的一条路途最近的道路,这段话读起来几乎就是马可·波罗著作的译本。这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国早期的历史文献,但是我没能找到它的出处。无论如何,由于它指的显然是现在从敦煌到罗布的道路,或者是古代楼兰道,所以这里有必要全部引用亨利·尤尔在威斯迪娄(Visdelou)译本基础上重译的段落。^②“中国历史学家马端临告诉我们,从中国进入维吾尔地区(直达焉耆)有两条道路。最长但最容易走的一条路过哈密;另一条短得多,只到罗布,显然与本章讨论的相对应。‘走这条路,你必须越过一个100多里格(1里格约当3英里——译者)长的平坦沙漠。除了蓝天和黄沙,你见不到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细微的道路痕迹可寻;除了人畜骨骸和驼粪,旅行者没有其他指路标志。在这荒郊野外,你也可能听到点声音,有时像歌声,有时像痛哭声。因此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旅行者走过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声音,于是远离了他们的队伍,便完全消失在茫茫沙海中,因为这些是妖魔鬼怪的声音。由于这些原因,旅行家和商人经常选择经过哈密的那条远些的道路。’”

免受袭击的沙漠
之路

马端临引用这段话作结论很有意思。这段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天山山麓地区只有少部分时间处于中国的绝对控制之下,而其余大部分时间一直受到匈奴及其后裔游牧民族的侵袭。因此,只要沿天山脚下延伸并经过哈密的那条路途更远的道路有安全保障,中国人总是愿意选择它,而不愿选择途经罗布沙漠的那条道路。这里有中国人性格和策略上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人们情愿面对和克服自然界的困难,而不愿面对来自敌人的危险。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为何尽管在古代,人们就必须面对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首先还是开通了楼兰道,并一直沿用了几个世纪的主要原因。尽管这条路相对较短,无疑也是受青睐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事实上可以免受天山北部地区匈奴及其直系牧民后裔的侵袭,我们随后将谈到这个情况。

沙罗赫的使节使
用的道路

我们不能指望弄清马可·波罗和他的叔父们,为何选择了经和田和罗布前往中国,而没走北边那条更好走的道路。在蒙古统治的全盛时期,“大汗”的庇护确保了各条要道上中亚商贸旅行者的安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将近一个半世纪之后,一位西方旅行者再次关注罗布沙道,同样也是由于北路不安全的原因。当赫拉特(Herāt,现阿富汗西北——译者)蒙古王子沙罗赫(Shah Rukh)派往中央帝国的使节,从撒马尔罕(Samarkand)前往中国肃州附近的边关时,他们走的是途经吐鲁番和肃州的道路。^③但是,当使团由北京回国途中,于1422年1月再次离开肃州时,“蒙古的骚乱迫使使团现在选择了南部那条穿越沙漠的不常用的道路”。或者像加特拉米尔(Quatremère)的译本所说:“对敌人的恐惧使他们取道沙漠之路,在雷贝阿瓦尔(rebi-awal)的第18天,他们历尽艰辛,走过了这段极度缺水而且前人也未走过的道路,在第二个朱马达(djoudada)的第9天,他们来到了和田。”^④

米尔扎·海达尔
所不知的沙漠之
路

这是我从目前所能找到的西方文献中,发现的有关罗布沙漠之路一直沿用到最近的记载。从米尔扎·海达尔对和田地区十分熟悉的事实来看,他没有提到这条道路,这使我们很有把握地认定,在他那个时期从塔里木盆地前往中国的商队,很少能在北部绿洲找到道路。我们在随后的世纪里,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点。因为当本尼迪克特·高斯(Benedict Goës)1605年率领一支载着珍贵物品的商队从叶城前往中国时,他仍然不得不走现在中国人走的要道,并且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经阿克苏、吐鲁番、哈密到达肃州。^⑤这一事实格外重要,因为高斯此前访问过和田,还明确地说过他在那里得到了玉石。对于那些希望越过使中国与世隔绝的长城,到中国寻求贸易机会的商队来说,玉石正是他们常用的贸易投资。很显然,从和田经罗布到肃州那条短得多的直通道路,在那时很可能已完全不再用于通商。

高斯走哈密线

被旅行家舍弃的
沙漠之路

人们难以相信,长年在塔里木盆地过着游牧生活的猎人和牧民,也就是罗布人的祖先,会完全忘却这条穿越沙漠前往敦煌的近道。同样,这样一条道路也不应该会逃脱中国统治者的注意。他们只不过刚在18世纪中叶才在乾隆帝统率下征服了新疆,刚刚系统地了解了这里的地形以及“新疆”的资源。^⑥事实上,一条至少部分地段明显与罗布沙漠之路相对应的道路,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地图上。这幅图被魏格纳(Wegener)博士和希姆莱(Himly)先生在“武昌府地图”里所引用,同时在“罗布泊问题”的各种争论中,这幅地图一直被广泛地应用,即便并不总是用于批判目的。^⑦但是,我在所能找到的有关“新疆”的地志资料中,唯一发现的有关这段路的资料却十分有限。这也加深了我从其他现象中得出的,从乾隆征服到1863年回民起事这段时期内,中国人对新疆知

① 参见朱利安《记》,第二卷,246页;沃特斯《玄奘》,第二卷,303页等;《古代和田》,第一卷,435页。

② 参见尤尔《马可·波罗》,第一卷,201页,上面引用了威斯迪娄为D'Herbelot(德赫比洛)的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1780)一书139页所作的附录。

③ 参见亨利·尤尔所引加特拉米尔对波斯使节记录的译本,见尤尔《契丹》,第一卷,271页等。

④ 参见上引书第一卷,286页等。柯迪尔的注所引雷哈泽克(Rehasek)版本(*Indian Antiquary*, 1873, 83页)写道:“他们离开奎尔(Qayl)(即肃州附近今嘉州关的边防站卡劳尔[Karaul]),由于交通要道不安全,他们选择了经过朱尔(突厥语,意即沙漠)的道路,经历艰难困苦之后,于第一个朱马达(Jomády)的第9天(5月1日)到达了和田城里。”

⑤ 参见尤尔《契丹》,第四卷,218页以下。

⑥ 关于在皇室的命令下,由耶稣长老会(Jesuit Fathers)所进行的调查,参见李希霍芬的《中国》,第一卷,690页。许多那时收集到的这片新征服领土的地理资料,可以在1778年出版的《西域闻见录》一书中找到。有关摘录资料最早见于蒂姆科夫斯基的《北京之行》(*Timkouski's Voyage à Peking*)。里特(Ritter)的《亚洲》(*Asien*)一书第五章329页,引用了从书中翻译的关于罗布以东地区水文资料的一段。尽管这段文字非常笼统,但至少表明中国人那时已经知道有几条越过它的道路。它也表明人们对那个时代罗布人的主要经济状况有相当的了解。

⑦ 参见魏格纳和希姆莱《北西藏与罗布泊地区》, *Zeitschr. der Gesells. für Erdkunde*, 柏林, 1893, 第二十八期。另外斯文·赫定《中亚》第二卷282页也引用了。这里没有必要考察这幅图上沿线所标的地名(而且本身可能是根据不同的资料所确定的地名)与此路上事实上的地形有多大的关联。关于希姆莱对这些地名的评论,参见赫定《中亚之旅》,145页,注②。

之甚少的印象。^①

这条沙漠之路那时已不再为商人所用,罗布对他们已没有任何吸引力。而且由于从罗布往西,直到克里雅河完全没有农耕聚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的道路也同样在上个世纪早期就已被弃而不用了。不过,我从我的向导穆拉·沙赫(Mullah Shāh)和其他罗布老人那里得知,在叛乱以前,从敦煌来的中国骆驼队冬天偶尔经过这条沙漠之路来到这里,用铁器等物品换取罗布地区盛产的各种干鱼。

◁罗布人关于此路的传说

但是,即使这种偶尔的交通行为到60年代初(指19世纪60年代——译者)也已中断了。那时由于阿古柏伯克政权在塔里木盆地的建立,以及东干反叛分子在甘肃的破坏行为,这里与中国的所有联系都被破坏了。因此,这条古老的商路已完全被人遗忘,只是从口头传说和中国史籍中才能找到它的影子。到了1891年前后,这里重新建立的中国行政当局出于战略和商业原因,急于开发南部绿洲,打开与中国联系的最便利的渠道,这条沿着古路前进的沙漠之路才重新被发现。一路陪我前往楼兰的优雅而忠厚的穆拉·沙阿本人,以及另一位罗布猎人,那时对此路的重新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曾尾随野骆驼,对库姆塔格沙漠最西地区进行过考察,对那个地区很熟悉。

◁沙漠之路的再发现

他们接受新疆的中国政府官员抚台或者说总督的指派,对此地进行考察并向他报告结果。经过一次失败之后,他们成功地引导从敦煌派来的其他几个人安全通过了季节性的疏勒河沼泽地带。我在墩里克营地附近的一座木碑上发现的汉文碑文,记载的正是这次颇有胆识的考察,在我的个人笔记中对此有所记录。^② 碑文上记的年代为光绪十七年,与我3个月前从穆拉·沙赫那里听到的完全一致。根据这个可靠记载,探路的主要困难出现在前往阿其克库都克的路上的沼泽地,以及拜什托格拉克以远那些让人误入歧途的台地和沙丘地带。

◁墩里克发现的汉文碑文

在重新发现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运气不佳的法国旅行家约瑟夫·马丁从敦煌出发,踏上了这条古代沙漠之路,随后在回国途中他死在了马尔吉兰(Marghilān,在今乌兹别克东部——译者)。他是目前所知的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位穿越了罗布沙漠的欧洲人。除了戈厄纳根据他的口述,对他经过和田的旅行作过一些记录外^③,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说明。不久就有了这段路线的第一份地图;因为1894年年初,P.K.科兹洛夫上尉(现在已是上校)作为V.I.罗博罗夫斯基上尉的中亚考察队的一员,从阿布旦旅行到敦煌,并用平板仪测量了这条道路。这张道路图已被收入“俄罗斯亚洲跨边界地图第21号”,它的最后一段是一幅1:840 000的大比例图,对那次在敦煌地区及其南面高山里的重要考察所获的地形调查结果作了说明。^④ 科兹洛夫上校这次调查的特殊价值在于,作为欧洲人,他第一次发现了曾经把孔雀河(Konche-daryā)水带入楼兰及这个大盆地东北部的库鲁克河(Kuruk-darya)的古河床。他的地图对我前往敦煌的旅行帮助很大,它确定了大山以远地区的现实路线,尽管它对疏勒河末端河道或其东段中国古代长城的大量遗迹并未作过任何提示。

◁马丁的旅行

◁科兹洛夫对路线的调查

1899年,法国外交官C.-E.伯宁(Bonin)曾试图从敦煌出发沿此路旅行。他只完成了最初的几段行程,但他却有机会认识到上面提到的长城遗存的性质及重要性。1905—1906年冬季,布鲁斯上校在莱亚(Layard)上尉和勘察员拉尔·辛格的陪同下,沿此线从阿布旦到达了敦煌,并记录了他的考察队在沙漠地区的艰辛经历。^⑤ 最后,在他们出发后两三个星期,E.亨廷顿教授开始沿同一条道路前往科什兰孜(Kōshe-langza),他从那里开始了勇敢而又值得纪念的旅行。亨廷顿向北正好穿越了辽阔的古罗布泊盐碱地直达库鲁克塔格山脚下,并获得了重要的地理知识。^⑥ 我在其他场合记录了我1907年发现的古罗布—敦煌路线,在甘肃与和田之间通商方面的作用。^⑦ 这里我可以补充我1914年旅行中的发现,那就是重新启用的古代商路至今仍在使用的。

◁沙漠之路上交通的重现

① 1823年出版的地理学著作《西域水道记》结合对罗布地区的总结性说明,赞颂吐鲁番长官:“向东可至敦煌和肃州。对这片土地的新说明如是说:‘从沙州的哈拉湖向西直行,不远即可达罗布淖尔;行程不需一月。’”随后引用了《汉书》和《后汉书》等文献的材料;参见赫定《中亚之旅》一书中154页所引希姆莱的说法。同一本书(上引145页注②)在讨论哈拉湖(疏勒河由此流向敦煌西北)时提到,此湖有一南一北两条道路与西边的罗布淖尔相连。

科尔迪耶在为尤尔的《马可·波罗》第一卷206页所作的注里,引用了帕拉迪修斯(Palladius)在 *Journal, N. China Branch, R. A. S., N. S.*, 第十卷(1875), 5页上的一段话:“1820年,或其前后,有人试图重新开通沙州与和田之间的古代直通道路。为此目的,一支10人考察队从和田出发,前往沙洲。这支队伍在沙漠中迷失了10多天,既找不到居民点,也找不到路,只是到处都是牧草和水流。”毫无疑问,在这段引语所根据的中文原始文献里,这里指的是那段路上唯一可供歇脚的地方。

② 参见《沙漠契丹》,第一卷,504页。

③ 参见戈厄纳《杜特雷伊·德·安探险队》,第一卷,46页。“在沙漠里的12天里,只有头两天与沙为伴,其余时间里与砾石为伍。”(由科尔迪耶摘录于尤尔的《马可·波罗》第一卷203页)说的显然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段道路的末端,由于接待了来自敦煌的伐木工人和牧民,马丁的中国随从可能知道这个地方。即便是这样,这个描述也并不十分准确。

④ 参见《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中亚探险报告》,1893—1895,罗博罗夫斯基上尉(俄国),第三卷(地图集),1899。科兹洛夫上校的旅行加上2天休息,共费时23天。

⑤ 参见《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173页以下。

⑥ 参见亨廷顿《亚洲脉搏》,248页以下。

⑦ 参见《沙漠契丹》,第一卷,345页、351页;第二卷,99页。这里可以从一个类似历史学的观点的角度指出,往返于和田的印度西北边陲的帕坦人商队,习惯于每年冬季例行地使用这条沙漠之路。



第四节 古代中国长城的第一批遗存

通往敦煌的道路▷
的第三段

从关于古老的罗布沙漠之路的历史观点出发,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讨论我经过的通往敦煌绿洲和沙州的道路上剩下的第三段。我的说明将很简要,因为随后的考古学调查中,我又回到了这段路上,并且做了五个多星期的工作。而对这些工作的记录,将是讨论这里地形的最佳资料。我第一次快速通过这里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此进行详细考察。地图 74、78 上显示的这段路的大多数地形特征,事实上是后一次调查完成之后才描绘出来的。^①

伯宁对遗址的提示

平坦的沙砾地一直延伸到我们 3 月 7 日到达的古代时令河流域以远最初几英里处。我们一直没有发现地面上有何有趣的现象(地图 74.A.3),从那里往前行进约 10 英里,地面既平缓又出奇的单调。但是由于期待着有考古发现,我从一走上这条道路的新一段时起就特别细心。从伯宁出版的横跨中国之行的简要报告中^②,我知道他 1899 年秋天到达敦煌之后,试图沿此路跨越沙漠去罗布。由于没有可以信赖的向导,或者他的中国随从不愿继续前行,他在到达哈拉湖以西第一批沼泽地之后,显然只好回到敦煌,继续沿山路旅行。在时断时续的努力过程中,他路过一些残存的烽燧,这使他回想起了他在甘肃“国道”沿线见到的“炮台”(他也正确地测量了经过它们附近的一段长城的几处遗存)。这位杰出的法国旅行家敏锐地猜到,它们的年代可能很古老,而且在历史上曾经很重要。因为它们表明这是“到目前仍未找到的、在汉朝控制下的经大夏、帕米尔、今新疆、戈壁以及甘肃直到中国内地的重要路线”^③。但是他这附带的提示没能帮助我,因为没有任何地图或路线图来事先确定这些遗址的地点。^④ 幸运的是,在离开阿布旦之前,我有机会询问重开此路的真正先驱穆拉他们,而且从我那有心人老向导的嘴里听到的信息燃起了我的希望:我可能会在这次前往托格拉克布拉克泉的路上遇上第一批“炮台”。

第一座废弃的烽燧

这个期望不久就变成了现实。第一座塔似的土台(附图 33 里的 T.II)在北面很远的地方,我们只是在路过那里时才发现了它。但是离这里两三英里远的第二个土台 T.I,我很容易地看出,那是不可能被认错的、保存完好的烽燧。当我在夯土层之间见到熟悉的红柳枝夹层时,我确信它的年代很古老。

烽燧 T.I 下的古河床

烽燧耸立在一片沙砾高地的陡峭边缘易于防御的地方。这片高地的两侧是被侵蚀的小型谷地,周围则是因风蚀而形成的洼地。洼地在此处足有 1 英里宽,上面有一条十分明显的古河床。河床在终碛盆地,沿着这片干旱的道路旁的干旱河谷,向西北方向延伸。沿着洼地底部延伸的一处长长的芦苇带,以及一长串表面干燥但地下仍有水的盐渍坑的存在,表明曾经有水流经这条古老的河床。河床的底部低于沙砾“塞”约 80 英尺。紧挨着烽燧的西边,有一个破坏严重的小型建筑遗迹,我想这里可能是烽燧守军的住所。下面的斜坡上发现的一些铁器、木刻残片以及一片较厚实的毛织品,证实了我的推断。第一次发现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文物,使我坚信,我日后的考古工作将会取得成就。但那时我没有时间进行近距离的调查,由于天已经黑了,我得赶紧追上我的队伍,好在在沙砾地上很容易找到他们。

托格拉克布拉克的疏勒河床

往前约 3 英里就到了托格拉克布拉克的营地。它位于陡峭狭窄的谷地,谷地里的一条冻实了的沼泽河旁长满了芦苇和灌木丛。沼泽河里的水可能来自泉水,这从我们的罗布人向导所用“托格拉克布拉克”的名字可以看出。进一步的证明则是胡杨树的存在,它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活着。但是,尽管在早上,我那时也看不到什么迹象,使我相信这里有一条活河,仅在不足 6 星期之后就变得几乎无法越过。^⑤

远处见到的烽燧▷
T.III

由于急于找到更多遗址,我 3 月 8 日一大早就出发了。沿着商路,在一个完全光秃的沙砾高地上行走了约 3 英里,我注意到东南方不远有一处像是遗址突起在地面上。这就是现在已标在地图 74.B.3 上,同时也见于附图 33 上的 T.III。所以我要求队伍继续前往下一个营地,并让蒋师爷和其他几个人带着坎土曼前往遗址处。事实上,前往那里的距离比估计的要远。因为这是一处被长满大量红柳丛和干枯的胡杨的宽阔沙性洼地所切断的辽阔平坦的“塞”。离开和田后第一次发现的车轮痕迹表明,敦煌的中国人曾远道来此寻找木材。最后,当我来到离沿洼地南边耸立的沙砾高地陡峭边沿前约 100 英尺时,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处遗址上(插图 149)。

烽燧 T.III 的建造技术

这是一座正方形烽燧(见附图 36 的平面图),每个侧面向上收缩至顶部,烽燧高现存约 20 英尺。它的底部为 16~17 英尺见方。它的建筑技法是用土坯一层层仔细向上垒砌,土坯的大小与第一次在 T.I 那里见到的一样,长 14 英寸、宽 7 英寸、厚 5 英寸。每隔三层坯,夹入一层芦苇层,以加强其坚固程度。烽燧上的土坯破损极小,只是在它的北面才能看出破损,而只有这点破损才能使人相信它是座废弃的烽燧。在南面,也就是一年内大部分时间不受风吹雨淋的一面,砌土坯的灰泥仍在原处。烽燧的附近也没有发现任何断墙的痕迹。除了烽燧自身之外,这里没有任何建筑遗址。随后在沙砾地面进行清理的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发现,而且这些堆积也不见有风蚀痕迹。

① 沿古代中国长城调查的结果,更详细地反映在附图 33 的地图上,它的比例是 1 英寸相当于 3 英里。

② 参见伯宁《从北京前往俄属突厥斯坦之旅》(Voyage de Pékin au Turkestan Russe),《地理学刊》,1901,173 页。

③ 参见上引伯宁那篇文章,由科尔迪耶引在尤尔的《马可·波罗》第一卷 203 页。

④ 这些遗址的线索也不见于反映罗博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地图上。

⑤ 关于此地带有很大欺骗性的地貌,应该提到罗博罗夫斯基上尉的报告所附的一份地图。图上托格拉克布拉克的一条小河,完全消失在洼地的北部。再往东的一处处孤立沼泽也画在了地图上。但是,在那份探险报告里,对疏勒河终碛河床的存在却只字未提。疏勒河从哈拉湖流出,与那些沼泽相连,在前面提到的地点以西继续延伸了约 70 英里。



但是,当我在周围的地面上仔细搜寻时,我很快就注意到,一束束排成直线的芦苇从一处松软的沙砾中冒出来。这些芦苇束位于烽燧北约 20 码的高地边缘附近。我没费多大力气,就沿此线向东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土丘顶上。到了那里之后,我能看到这条线笔直地通向视线内 3 英里以东的另一座烽燧(T.VII)。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从此处沿沙砾斜坡下行至高地的一个较低的阶地,然后延伸到上面提到的那个洼地上的墙。显然,这就是早期“中国长城”的一段,这正是我根据伯宁的调查而正在寻找的。在那个低矮土丘上稍作发掘,就证明事实上我已经站在了长城的遗迹上,插图 149 上标明了我发掘的情况。清理面向北部洼地的斜坡上的沙砾和细沙堆积之后,我发现了一段很规整的墙。它的建筑形式在我第一眼见到时觉得很奇特,但很快我就对此相当熟悉了。

◁长城线的发现

这里的墙由芦苇束层和夹沙的黏土层交替往上筑,前者厚 2~4 英寸,后者 6~7 英寸厚。芦苇束水平放置,而且总是与墙的走向呈直角。它的长度非常一致,接近 7 英尺。芦苇层的原始厚度很难确定,因为上面一层层往下形成的巨大压力,几乎把它压成一片。但是,就每一层而言,除了盐碱渗入芦苇纤维之外,它们还具有很大的弹性,表明其年代不会很久远。墙的外面有一个完全由芦苇条组成、与墙的方向平行因而也就与墙内芦苇束垂直的保护层。这些芦苇条能更容易地从保护层上取下来进行测量,因此发现它们也都是 7 英尺长,每层本来的厚度约为 8 英寸。每两个保护层之间相隔 6 英寸,每层都用树皮捆绑起来,并用穿过墙体的红柳皮绳固定在墙上。

◁墙上用的芦苇条

墙面或者保护层、芦苇束的保存,显然得益于沿墙脚堆积的细沙和沙砾的保护。由于这个保护层变薄甚至消失,在此以上的部分则完全被风蚀。墙体的黏土沙砾层起初无疑是就地取材,由于随后考察中所发现的盐的黏合作用,它们具有像水泥一样相当牢固的性能。不过,在我们试掘的那个点上,揭露出来的墙体只有约 5 英尺高。大量沿此断墙下堆积的粗散沙砾及粗沙,原来可能就是现存墙体以上现在完全垮了的部分。

◁受风蚀影响的墙体

那时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去调查这段奇异的墙在建筑方式上的细节,也不能有步骤地去寻找一些关于其年代和起源的线索。但是,即便第一次只是粗粗地刮了刮,也使我得到了幸运的机会,发现了一些显然较古老的遗物。在墙体部分暴露的那个点上,芦苇束里发现了灰色丝织品残片(T.III.i.001.b)、一块结实的大麻白布片,和楼兰遗址发现的一样。还发现了铁器残片,包括可能属于石弩的箭杆(T.III.i.001.a、002~004),一段木棒头(T.III.i.005),以及一段胡杨细枝等。但是更让人兴奋的是一小块木片,它约 4 英寸长,背后有一个榫。正面有 5 个汉字,尽管墨迹已经很淡,仍容易识读。蒋师爷当时就说明,这块木标签所标记的物品是“卢定世衣囊”,而释文也已收录在沙畹的《文书》里,编号为 No.674。^① 这里并没有我所期望的年代线索。不过,由于书写方法显得相当古老,所以尽管完全不懂汉学,我还是斗胆对蒋师爷说这是汉代的,我的猜测后来证明是对的。但是,像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我这位优秀的文字学家也只是在持谨慎保留态度的同时接受了我的说法。^②

◁T.III 处的第一批发现

◁木片上的汉字文书

这件文书和其他小件物品发现于很小的范围内,表明尽管处于沙漠环境中,墙下的某个地点明显被人使用过。那时我很难解释它们是如何由于偶然机会,到了第一次调查的那个点上的墙里或墙下的。最可能的解释似乎是,这些小件物品可能来自修烽燧、筑墙的工人的营地,它们偶然混入了修墙的材料里面。在我 1914 年的调查过程中,这个猜想得到了确认。我在同一地点进行了清理,在地表下的生土层发现了更多的丝、毛织品碎片,以及一些动物粪便及其他垃圾。

◁证明此处有人类活动

当时对我来说,比这些细节更为重要的是一直向东远去的长城,以及远处可见的一连串的烽燧。从这个角度来说,是运气使我在这里见到了边防线——我现在已经很有把握地认清它。由于 T.III 是由这些烽燧护卫的长城大拐弯处的制高点,它本身就为我提供了一个进行初步调查的极佳位置。在此以西仅 2 英里左右,同一个沙砾阶地的最后一个山脚上,耸立着另一座烽燧 T.IV.b。虽然更远,但在西南方向至少还能见到两座烽燧。这里我可以指出,由于这个制高点可以观察到其他烽燧,也由于在这片光秃秃的地面可以看得很远,因此勘察员拉姆·辛格甚至不用望远镜即可凭他那双锐眼测出其中一座烽燧 T.V 离此处的直线距离有整整 9 英里,另一座 T.V.a 不少于 15 英里,后来的调查证明确实如此。东边 3 英里强的地方,正好在可见的长城直线上,烽燧 T.VII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它以远的烽燧 T.IX,似乎表明那儿是长城拐向东北的转折点。^③

◁视线里的烽燧链

那天已经太晚了,不能对西边的长城进行调查。相反,我决定调查东边的长城线和烽燧,希望那边的遗址分布在我的队伍向前行进的路线范围之内。这个决定是对的。我沿着随陡峭的沙砾坡延伸下去的古长城前进,并越过界定前面提到的长满灌木丛的峡谷的低矮台阶状地区后,长城残墙越来越高。从这里往前 1 英里范围内,墙体是连续而没有断开的。而且事实上暴露在地表以上 5~7 英尺,墙的平均宽度约 8 英尺。即使不经过任何挖掘与清理,也很容易发现这里独特的建筑方法,以及虽缓慢但不曾中断的风蚀作用过程。^④

◁向东延伸的长城线

在大多数地方,水平固定的芦苇束保护层被侵蚀了,而其他地方则已经松了。交替往上筑的夯土层和芦苇层也就相应地暴露在外,但是它们仍然保存得相当好。尽管材料很松散,充满着沙砾和小石子,但厚 6~7 英寸的土层看起来黏合得很好。这显然是由于

◁芦苇束延缓侵蚀过程

① 参见沙畹《文书》,143 页。这件标签的编号 T.III.i.1 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书中错误地编为 T.i.1。

② 参见《沙漠契丹》,第一卷,542 页。我这位很有学问的中国伙伴这次的自我怀疑,被一位很有实力的汉学权威希尔特(F.Hirth)教授所否定。他 1912 年 8 月 15 日在《民族》(The Nation)一书中,对此工作给予了特别称赞。

③ 这里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为了避免给调查工作带来混乱,也为了日后对这个点予以确认,有必要随时给平板仪测出的图上的烽燧编号。因为它们是从一连串的观测站观测到的,即使当初没有机会得到几条“线”或其他方法来确定它们的准确位置。这种事实上的必要性,以及由于众多烽燧位于地表多变的地点,以及建筑遗存本身的破损不能从远处分辨清楚的事实,可以帮助说明为何不能对长城沿线各烽燧按其所在位置的前后,严格按顺序标上号码。

④ 插图 157 和 158 里的照片,可以帮助说明下面将要讨论的观测结果。虽然这是敦煌东北部长城的一段,但是与其他地段相反,这里的树枝层要厚于黏土层,而且这些树枝层里除了芦苇之外,还加入了红柳枝。见第十五章第五节。